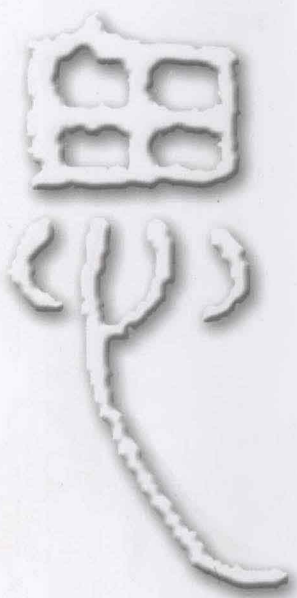




郑大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系列

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前沿诸问题

郑大华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郑大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系列



郑大华 著

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前沿诸问题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前沿诸问题 / 郑大华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648 - 0926 - 3

I. ①中… II. ①郑…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2583 号

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前沿诸问题

郑大华 著

◇选题策划: 周玉波

◇责任编辑: 刘苏华

◇责任校对: 蒋旭东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853867 88872751 传真/0731. 8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利君漾印刷厂

◇开本: 710 mm × 1000 mm

◇印张: 23. 5

◇字数: 409 千字

◇版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648 - 0926 - 3

◇定价: 50.00 元



郑大华

湖南永顺县人，1990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先后主持或承担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重点课题和省部级重大委托课题，出版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著作14种、译著5种（含合译），点校整理资料9种13册，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现任湖南省人民政府“芙蓉学者计划”首批特聘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国内外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兼职教授或兼职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郑大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系列

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前沿诸问题
近代中国思想脉络中的文化保守主义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
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
晚清思想与晚清社会
晚清思想的发展历程
思想家与民国思想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
梁漱溟的生命历程与思想世界
张君勱与近现代中国学术
“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张君勱

写在前面的话

本书是我近 10 年所写的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前沿诸问题的部分文章的结集，它们先后在《光明日报》、《近代史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收入本书时个别文章在题目或内容上作了一些小的改动。由于这些文章涉及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些重大理论、方法和热点、难点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本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了新的思考，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见解，多有创新；同时我也认为，要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取得更多更大的研究成果，就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不是另起炉灶，否定或是推倒前人的研究成果重来，而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探索、继续前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文章是在近 10 年期间先后写成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所改变，因此一些文章在逻辑或观点上有前后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地方。为了尊重历史，收入本书时仍保留了原样，没有对这些前后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文章进行修改。

本书分为六编。第一编和第二编是“理论与方法”。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是五四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虽然已有 90 多年的历史，但学术界却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研究，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逻辑起源、历史分期、演化动力等有关学科建设的一些理论问题缺乏应有的讨论，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思想史究竟应该写些什么没有统一的认识，许多思想史著作写进了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的内容，甚至以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为主，学科界限混淆不清。与此同时，受革命史观的影响，长期以来政治或政治史统帅一

切,包括思想史在内的其他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都以政治史的开端为开端、分期为分期。凡此种种,都严重地影响着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有鉴于此,在第一编和第二编中,本书就上述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自己的一孔之见。此外,本书还就加强近代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互动关系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特点、推动近代湖湘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报刊在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地位以及报刊的研究方法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第三编和第四编是“热点与难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就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与激进,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演变与影响,社会主义的传播和发展,爱国与卖国,启蒙与救亡,改良与革命,以及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这些问题既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难点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不仅有它的学术价值,更有它的现实意义。收入第三编和第四编的11篇文章,便是我参加这些问题讨论的部分成果。

第五编是“交流与碰撞”。自2006年以来,在《光明日报》“史学版”的支持下,我先后组稿了5期学术对话。由于“对话”这种体裁形式活泼、信息量大,加上所讨论的问题又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些重大社会思潮和历史事件,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五四运动、保守与激进、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对于这些问题不仅学术界,一些普通读者也有强烈的兴趣,因而这些对话刊出后引起了较大的学术和社会反响。

第六编是“回顾与展望”,包括“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90年代以来‘五四’东西文化论战研究述评”、“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及“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5篇文章。温故而知新,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认真的总结和述评,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开拓和创新。

附录的3篇文章,一篇是评论曾经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一篇是评论曾引起广泛争议的冯天瑜先生的大作《“封建”论考》,一篇是我承担的湖

南省重大委托课题《湘军与近代以来湖湘文化的发展》的最终成果。尽管它们涉及的也是一些重大理论和热点、难点问题，但因体裁的关系，作为“附录”，放于书后。

以上是对本书主要内容的简单介绍。正如我在拙著《民国思想史论》的“前言”中所写到的那样，我们今天遇到的、讨论的、感到困惑的许多思想文化问题，也都是近代中国人曾遇到过的、讨论过的、感到困惑过的问题。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能为我们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因此，我真诚地希望学术界能关注、重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真诚地希望更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尤其是青年朋友加入到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队伍的行列中来，真诚地希望出版界能出版更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也正是出于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这一目的，我才抛砖引玉，斗胆地把自己近几年所写的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前沿诸问题的部分文章结集出版，尽管它们很不成熟。

本书的出版，要感谢近几年我服务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们，是他们给我提供了优良的研究条件和工作环境；感谢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已故林增平教授和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已故龚书铎教授，是他们把我引领进了学术研究的神圣殿堂，没有两位恩师的栽培，也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感谢我的父母对我的培养以及为培养我所付出的心血。父母虽然是一字不识的农民，但却以他们的善良和勤劳，含辛茹苦地培养出了两位博士、两位大学生和两位中专生（我们兄妹七人，大哥早年参加工作），母亲因长期积劳成疾，于10多年前病故。由于母亲病故得十分突然，我当时不在她的身边，这使我遗憾和内疚不已。在我编辑、校对该书期间，89岁的老父亲又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悲痛之中我感到一点点宽慰的是，自父亲生病住院那天起，我就一直陪伴在他的左右，服侍照顾他老人家，父亲最后是躺在我的怀里安祥地离去的，10多年前母亲离去时我没有尽到的责任和孝心，终于在父亲这里尽到了。我谨以本书和已出版、发表的所有著作和文章作为鲜花，供奉于父母的灵前，安息吧！父母双亲，儿子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感谢我的妻子任菁和儿子郑韬对我所从事工作的长期理解和支持，因为在经济大潮

的今天，从事纯学术研究，既不能给家人带来任何物质文明，也没有时间陪家人享受丰富的精神文明成果；感谢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周玉波社长、黄林副总编辑和本书责任编辑刘苏华先生，这是继《晚清思想史》之后，他们出版我的第二部著作；感谢所有长期关心我、支持我、帮助我的师长、同事、亲人和朋友。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我只有以更大的努力、更多的成果，来报答所有关爱我、支持我、帮助我的人们，并真诚地希望能继续得到他们的关爱、支持和帮助。

我在湖南师范大学的第一个博士后、湖南大学的刘平副教授通读了全书，校正了不少错别字，并对个别语句作了润色和修改；2010级硕士研究生严志、田力、刘莹、任志胜、张祚崑，2011级硕士研究生李鹏、翟明龙、刘姗、任芳葳等同学帮我校对了所有原文。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对本书提出批评和指正，因为我深信，正常的学术批评，是帮助作者进步、促进学术繁荣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来信请寄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近代史研究所，邮编 100006；或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邮编 410081；也可以发至我的电子邮箱：zhengdh2002@yahoo.com.cn。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郑大华

2012年7月20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编 理论与方法（上）	(1)
一、如何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1)
二、中国近代思想史开端之我见	(5)
三、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	(11)
四、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三个误区	(16)
五、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	(22)
第二编 理论与方法（下）	(35)
一、加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研究	(35)
二、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几个特点	(40)
三、如何进一步深化近代湖湘文化研究	(43)
四、报刊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47)
五、略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66)
第三编 热点与难点（上）	(80)
一、辩证地看待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与激进	(80)
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	(86)
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过程	(94)
四、中国近代社会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	(119)
五、西学东渐：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桥梁	(134)
第四编 热点与难点（下）	(139)
一、晚清爱国主义的三个特点	(139)
二、从徐继畲看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	(144)

三、也谈“救亡与启蒙”之“双重变奏” ——从维新变法运动说起	(149)
四、如何认识中国近代史上的改良（或改革）与革命	(161)
五、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	(167)
六、近代思想家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	(179)
第五编 交流与碰撞	(200)
一、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对话	(200)
二、关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对话	(211)
三、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对话	(220)
四、如何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	(230)
五、继承五四，超越五四 ——纪念五四运动 90 周年的对话	(239)
第六编 回顾与展望	(251)
一、90 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	(251)
二、90 年代以来“五四”东西文化论战研究述评	(276)
三、90 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87)
四、90 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301)
五、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310)
附录	(322)
一、《走向共和》离历史究竟有多远	(322)
二、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 ——读冯天瑜教授的新著《“封建”论考》	(333)
三、湘军与近代以来湖湘文化的发展	(338)

第一编 理论与方法（上）

一、如何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在认真总结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界面临的任务。在此，笔者略抒管见，欢迎同行批评指正。

（一）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

概而言之，过去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非历史主义的现象比较严重。如有的人在评价辛亥革命时，不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从假设的前提出发，得出了辛亥革命搞糟了、打断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错误结论。有学者把这种观点称为“假如”史学。这种“假如”史学显然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再如有的人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反儒学，但他们从来没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什么会激烈反传统、反儒学的历史原因作认真分析，没有考察辛亥革命后复辟与反复辟、尊孔与反尊孔的政治与文化斗争，因而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反儒学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意义。

与这种非历史主义相联系的是僵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仍然盛行。过去，人们受“左”的思想影响，一味肯定革命、否定改良，凡主张社会改革者，必戴上一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大帽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出现另一种情况，一些人一味地肯定改良、贬斥革命，凡主张革命者，必戴上一顶“激进主义”的大帽子。这两种观点看起来针锋相对，实际上都是僵化

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因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切改良与革命，都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情况非常复杂。就改良而言，既有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如 19 世纪末的戊戌变法以及 20 世纪初的立宪运动，又有社会上的一些有识之士倡导和参加的社会改良运动，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运动，还有统治阶级出于自救目的而采取的一些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如 19 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以及 20 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这些不同类型的改革，其社会作用和意义不能一概而论。从革命来看，有农民领导的旧式革命（太平天国革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辛亥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些革命的历史作用和意义也不尽相同。改良对推动社会变化和进步有它的积极作用，我们应予以充分肯定，然而当社会各种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时候，改良便走入历史的死胡同，而革命就成了历史的选择，这时再过多地肯定改良，则是对历史的误解。“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但革命的发生，有它的历史根据，只有条件成熟时，它才会爆发，人们并不能“为所欲为”。

另外，过去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盲目“创新”问题也很严重。创新无疑是学术发展的不竭动力，但创新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就历史学科而言，任何创新都不能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然而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许多“新观点”、“新见解”都与史实相差甚远。比如，有人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袁世凯上台后所推行的政治宽松政策培养出来的，因而对民国初年的袁世凯予以充分肯定。又有人认为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体西用”是当时中国有可能实现近代化的唯一正确模式，如果不是康有为激进主义改革的破坏，它有可能取得成功，因此把康有为说成是中国未能实现近代化的罪魁祸首。还有的把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中断归罪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认为要不是辛亥革命中止了清政府的新政改革和预备立宪，要不是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战争对南京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干扰，中国早就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些观点新则新矣，但它并不符合历史真实，与真正的学术创新可谓风马牛不相及，而且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不良影响。

（二）加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研究

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是“五四”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历史虽然不短，但学术界却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研究，对

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其他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以及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等等,都缺乏应有的讨论。直到今天,学者们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究竟应该写些什么,没有统一的认识。葛兆光提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是知识、思想与信仰,并据此写成两卷本的《中国思想史》。该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较大反响,赞扬者有之,批评者也有之。但就书中所涉及的晚清部分来看,似乎不太成功,至少它没有给读者提供一个晚清思想史发展的清晰脉络。又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是研究这一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尤其是社会政治思想新陈代谢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还有学者提出近代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性质的思想、观念和主张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笔者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内容是由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进步,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这既包括从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也包括从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转变,即所谓“近代化进程”。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相依相存,民族独立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保障,而社会进步又是实现民族独立的前提。围绕这两大任务,近代中国人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和主张,有时还展开激烈的争论甚至斗争。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各个不同时期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所提出的思想、观念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如果以不同时期的中国人围绕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两大任务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争论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中国近代思想史不仅自然而然地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分支学科区别开来,而且也与各种专门思想史区别开来。因为“作为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认识的辩证运动”,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①。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是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即古今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

① 冯契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合。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主要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换与现代学术的建立。至于各项专门思想史，它们研究的内容是由它们所属的分支学科（如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等）的研究内容决定的，由于它们所属的分支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完全相同，它们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就必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以上只是笔者粗浅的想法，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但希望学术界对此应有高度的重视。因为只有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其他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搞清楚了，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三）正确处理好三种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思想家思想与人民大众思想的关系。一提到思想史研究，首先就涉及其研究究竟是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还是以人民大众的思想为主的问题，这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老话题。笔者以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一方面要重视思想家的思想，至少应以思想家的思想为研究的切入点。这是因为：第一，与人民大众比较，作为社会精英，各个时期的思想家尤其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对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有更敏感和更深切的感受，更能触摸到时代的脉搏。第二，思想家的思想往往是一般社会思想和动向最集中、最典型的反映，是它们的浓缩体。这也是思想家的思想所以能影响社会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人民大众的思想，尤其要重视人民大众思想对思想家思想的影响。实际上思想家的思想和人民大众的思想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同时，我们在研究思想家的思想时，要特别注意加强对思想家的生活时代和生存状态的研究，加强对思想家的思想是通过何种方式和渠道影响人民大众、从而影响到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

二是要处理好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特点，是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的脱节。这表现在两个方面：（1）就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往往是思想理论超前，而社会实践滞后。比如早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魏源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直到洋务运动时期，这一思想才付诸社会实践；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维新思想家就提出了设议院和君主立宪的要求，但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才宣布“预备立宪”。如此等等。

(2) 就思想家个人来看,社会实践落后于思想理论的现象也较普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康有为。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前后,他是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积极要求者,但到了“百日维新”期间,他只要求设制度局于宫中,再不提设议院的事。康有为也宣传过西方的民主、人权和自由,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则是一个典型的权威主义,甚至是一个专制主义者。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时,一定要把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不能光看思想家们说了些什么,还要看他们做了些什么。只有如此,才能对思想家做出合乎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

三是要处理好思潮史研究与思想家研究的关系。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思潮风起云涌,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够,虽然侯外庐等学者曾提出过应当研究近代的社会思潮,但学者们的研究仍多以思想家为主,那些以“中国近代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基本上是各个时期一些主要思想家思想的汇编。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有了改变,思潮史研究异军突起,蔚成风尚,相继出版了一大批以“思潮史”命名的著作。以思潮为线索构架中国近代思想史无疑是对此前以思想家为线索构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大突破,但也同样存在着缺陷或不足。如果说在那些以思想家为主要线索构架而成的思想史著作中,寻找不到中国近代思潮的演化脉络的话,那么,在那些以思潮为主要线索构架而成的思想史著作中,则看不到主要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动。而缺少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动的思想史著作,其学术价值就必然要大打折扣。一部好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应该是思潮史研究与思想家研究的完美结合,即以近代思潮的演化脉络为经,以主要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动为纬,经纬交织,一方面要以思想家的思想来见证思潮的演化,另一方面又要以思潮的演化来加深对思想家思想的解剖。

(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05年1月25日“史学版”)

二、中国近代思想史开端之我见

众所周知,中国学术界一般都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把此前的历史称之为古代史,此后的历史称之为近代史,也就是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了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分界线。与此相一致,1840年的鸦片战争也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分界线,国内出版的几乎所有中国近

代思想史著作，包括近年来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都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写起的，或者至多只是对鸦片战争之前魏源、龚自珍等人的思想作一简略的追述。最近有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外因决定论的历史观。在我看来，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界线的确值得重新思考。因为，第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思想史的发展有其连续性，以某一重大事件为标志把它分为前后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虽然便利了学者们的研究，但却割断了思想上的联系，使前一时期的思想成了无终之果，而后一时期的思想则成了无源之水，思想的连续性被人为地中断了。第二，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界线，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的确具有外因决定论之嫌，这种观点只看到1840年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思想向近代的转型，而没有进一步探讨西方挑战所以能引起中国思想向近代转型的原因，忽略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所孕育的一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尤其是经世思潮的复兴。如果没有这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没有经世思潮的复兴对乾嘉考据学风束缚的突破，西方挑战引起的可能是另一类型的反应，即：不是中国思想向近代的转型，而是固守传统。第三，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是近代中国人围绕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这两大任务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争论，^①而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任务虽然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才正式提出来的，但追踪溯源，它们都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之前。众所周知，鸦片战争的起因是中国的禁烟，而中国所以禁烟，是由于英国大量向中国非法输入鸦片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危害。对于这种危害，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以包世臣、林则徐、黄爵滋、龚自珍为代表的经世思想家和具有经世思想的官员就进行过揭露，也正是在他们的要求和推动下，中国的禁烟运动才开展得轰轰烈烈。至于社会进步，也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魏源、包世臣等人就对清王朝衰世下的种种黑暗现实和君主专制统治进行过揭露和批判，提出过“更法”和改革主张，尤其是包世臣和魏源提出的漕运和盐法改革，已注意到商人的利益和作用，并提出了“农商并重”的新思想，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冯桂芬写出《校邠庐抗议》之前，在这两个方面都还没有人能超越他们。

根据上述这些认识，我主张以整个嘉道年间而不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

^① 参见拙作：《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光明日报》2005年1月25日“史学版”。